

二戰世代美國中國通霍金斯教授殞落之後

文/周祝瑛(政大教育系教授)

近年來，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，影響雙方的文教交流與學術合作，尤其對於中美雙方大學中裡既有的研究資源與人才培育工作，也受到波及。

儘管如此，美國至今仍是全球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發展較早，人才匯聚的重要國度。尤其自1980年代，中國大陸開放海外留學政策，每年數以萬計的留學生與訪問學者湧入美國各知名大學，進行交流與學習。其中，不少人後來選擇留在美國高教服務，為全美中國問題研究加入新血。

而促成此種趨勢的幕後推手，應歸功於當年這些人在美求學時的指導教授與授課教業師，透過這些美教授嚴格的學術訓練，包括，西方學者較為完整的知識與理論體系；師生地位比較平等，透過課堂與論文討論過程，進行自由辯證與對話；美師對於周遭環境與世局變化較為關心，藉此訓練學生對研究問題的敏感度、社會建構與科學方法；提供研究助理或教學助理的機會，訓練學生解決問題與獨力作業的能力等。

約翰·霍金斯：見證文革、投入美國與亞太合作的中國通

儘管有一些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對第三世界抱有既定的想像，對中國存在偏見或幻想，甚至因文化與語言等隔閡，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等同於西方左派思想等解釋。但也不乏能夠較為客觀與中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，其中之一為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約翰·霍金斯教授（John N. Hawkins, 1944–2020），這位待人謙和有禮的美國知名中國通，曾擔任美國中國研究重鎮之一UCLA國際事務部（ISOP）主任，長期致力於該校與東亞地區如：中日韓諸國學術交流，且早1980年中期開始接受與協助無數來自海峽兩岸的留學生與訪問學者，指導兩岸與國際文教相關議題。退休後更透過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的資深學者論壇，推動與亞洲及中國大陸的各式學術交流與合作課題。其生平經歷堪稱中美近半世紀以來關係發展的最佳見證。

霍金斯教授年輕時曾有過與中國傳奇蹟式的相遇，在文革初期因緣際會造訪許多內地城市，親眼目睹當時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。由於是外國人，歸程中難免受阻，最後在火車上被迫高喊「毛主席萬歲」等口號，作為

脫身保護傘。不料返回美國後，卻遭安全人員上門盤查，最後遭到護照扣留等處份。

後來透過這段類似拘禁時間進大學深造，完成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博士論文，更在文革（1966–76）結束前2年，於1974年出版少見的「毛澤東教育思想」專書，封面上更印有獲毛澤東接見的合照，成為美國當年中國大陸領導人教育思想的唯一的著作，也開啟他日後持續在中國教育及社會變遷等議題，投入學術研究與交流實務的旅程，以UCLA為據點，拓展美國高教與東亞各國的交流與合作；擔任美國知名的比較教育評論（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）期刊主編。在UCLA任教30多年間，指導過無數兩岸與世界各地研究精英，這些人畢業後遍及各國學界與政界。UCLA更成為美國研究中國教育的學術重要窗口。

關注台灣發展，鼓勵國際合作

如同其他二戰世代的中國通一般，霍金斯教授出生於1940年代中期，成長於美國1960人權運動年代，也親眼經歷了反越戰年代風潮。由於親身目睹文化大革命，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，勸阻門下即將前往中國田野調查的博士生，也幫助許多大陸學生完成學業與日後就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霍金斯十分關注台灣的發展，雖不主張兩岸之間的比較研究，但認為台灣在華人社會中頗具特色，因此大力促成美國最大出版社，出版臺灣教育專書。

他語重心長的提到：國際與美國的中國研究，大多以大陸為主，對於其他華人社會，如：臺灣，甚少重視與理解，因此有必要增加國際合作，加強台灣的學術能見度。他這一番談話，提醒世人學術研究不僅限於主流議題，也需抱持關照、理解他者的多元思想與同理心。這是美國中國專家中少見的客觀評論，值得一書。

霍金斯退休後更不辭辛勞，每年飛來臺灣中部參加及主持教育領導人員培訓講座，並邀請在台門生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計畫，堪謂退而不休。

研究內容受大環境影響

根據維吉尼亞大學何漢理教授（Harry Harding）與筆者等的研究發現，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發展，除了與大環境發展有關，也與其中的中國通的研究重心有關：

（一）1960年代，由於戰後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，與各種基金會的資金投入，促成美國由傳統的漢學（Sinology）走向中共建政對中國社會等衝擊的中國研究（Chinese Studies）。

（二）1970年代，美國經歷越戰與大陸文革的發生，使得美國學者採用批判等理論，由整體觀察轉向城鄉等個案研究，透過各種理論模式，分析中國的政治變化。

（三）1980年代，受前一年「中美建交」影響，美國學界得以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。

（四）1990年代迄今，美國研究學者從以往必須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，過於仰賴經驗性分析，轉而針對中國特有的環境發展變化，進行探究。此外，此階段因湧入大批中國留美學生，畢業後進入各學術機關工作，使得該領域增添一批通曉中文、了解中國文化社會脈絡，且受西方學術訓練的生力軍。然而自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，美國政府預算有所調整，各大學相繼成立中東問題研究中心，影響原有的亞洲事務研究。至於有關中國問題研究，也因更多生力軍的加入，一改過去中國政治外交等重心，轉而朝向經濟貿易等課題，甚至隨著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的日益頻繁，更多大學加強對中國文化外交等軟實力的施展工作。

綜合上述，美國二戰後中國通世代因年事已高，或退休或辭世。今年（2020）六月中UCLA霍金斯教授的過世，令人感嘆這一世代的相繼凋零。他們身後留下的學者風範，與所培育的學生，正在美國、海峽兩岸與世界各個角落，發芽與茁壯。正可謂：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

原文網址: <https://gvlf.gvm.com.tw/article/75509>